

择偶偏好与同型婚配

——来自择偶偏好调查实验的证据

石泽华 周扬*

摘要: 本文基于择偶偏好调查实验估计无摩擦择偶偏好并借助延迟接受算法模拟由此形成的稳定匹配,对比真实婚姻匹配以探讨择偶偏好如何塑造同型婚配。研究发现:男女均偏好于年龄、教育相近的伴侣,但女性显著偏好高收入男性,且两性均厌恶低于自身收入的伴侣;模拟的无摩擦稳定匹配接近于真实匹配,表明择偶偏好是塑造同型婚配的主要因素,其中水平偏好相对于垂直偏好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 择偶偏好; 婚姻匹配; 延迟接受算法

DOI: 10.13821/j.cnki.ceq.2025.06.11

一、引言

婚姻匹配是指男女在婚姻市场中择偶和结婚的非随机过程,是婚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Chiappori, 2020)。一方面,婚姻匹配直接影响结婚、离婚及由此派生的生育、教育、养老、代际和代内关系等人口与家庭经济议题 (Bratsberg et al., 2023; 刘怡等, 2017),当前社会中的初婚年龄推迟、终身不婚率和离婚率提高等现象,均与婚姻市场匹配不稳定有关 (Garcia-Hombrados and Özcan, 2024)。另一方面,婚姻匹配也间接影响就业率、劳动参与率、收入分配、消费结构等宏观经济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未来经济发展 (Greenwood et al., 2014; 程时雄, 2022)。当前中国婚姻市场中,婚姻匹配的主流模式是具有相似社会属性的群体更倾向于彼此结婚,也即形成同型婚配 (马磊, 2019)。

国外婚姻经济学界基于匹配理论考察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婚姻匹配问题积累了丰富成果^①,如 Hitsch et al. (2010a)、Banerjee et al. (2013) 等直接应用匹配模型探讨婚姻匹配,Choo and Siow (2006)、Choo (2015)、Chiappori et al. (2017) 等拓展匹配模型探讨婚姻收益分配。相比之下,基于匹配理论对中国婚姻市场的实证研究则相当有限: Han et al. (2015) 构建匹配模型探究我国户口继承制度改革对同型婚配的影响; Chen and

* 石泽华,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周扬,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周扬,北京市昌平区顺沙路沙河段 1 号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102206;电话:18401643200;E-mail:zhouyang831@cufe.edu.cn。本研究得到中央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JYXZ2409) 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和期刊主编的建设性意见,以及谢宇教授提供的宝贵建议,同时感谢学友黄宇恒、陈嘉喆在讨论中给予的启发。文责自负。

① 婚姻经济学中主要包含两类理论模型:搜索模型 (search model) 和匹配模型 (matching model)。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理论建模时是否强调描述市场中的摩擦。搜索模型的核心是探讨一个存在搜索摩擦的市场环境中的婚姻匹配及其收益问题,在理论建模时考虑了搜索成本和机会成本。而匹配模型则假设一个无摩擦的市场环境,即在匹配过程中,每位女(男)性可以自由接触到所有潜在男(女)性配偶,并且对他(她)们的特征有完美的了解。

Choo (2023)、Huang et al. (2023)分别基于 Choo (2015)与 Choo and Siow (2006)的匹配模型,研究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对年龄和民族同型婚配的影响。这些研究多聚焦于某一外部制度冲击,借助匹配模型评估政策如何影响我国同型婚配模式(及其变化),也即主要从宏观或外部结构视角,分析社会经济制度对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塑造。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文旨在从微观或内在择偶偏好视角出发,借助匹配模型,系统考察个体择偶偏好与婚姻匹配之间的关系,为当前我国婚姻市场中同型婚配的形成逻辑提供新的解释视角,丰富既有关于中国婚姻匹配的实证研究。

既有文献在讨论同型婚配行为及其形成机制时,提出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外部结构性因素所带来的搜索摩擦(search frictions),二是个体对潜在配偶的内在择偶偏好(Abramitzky et al., 2011; Banerjee et al., 2013; Hitsch et al., 2010a)。具体而言,一方面,同型婚配可能是由于搜索摩擦造成的,而无关乎个体偏好。人们在婚姻市场中面临的机会结构约束不同,因此择偶时的搜索摩擦也不同。外部约束越多,搜索摩擦越大,择偶范围越窄、难以跨越社会或物理边界,从而更易形成内婚制或同型婚配(马磊, 2019)。例如,教育同型婚配可能并非反映个体对相同教育伴侣的偏好,而可能仅因教育背景相似者更多地出现在同一社交空间。另一方面,即使没有搜索摩擦,同型婚配也可能是择偶偏好在婚姻市场均衡机制作用下的自然结果。既有研究指出,个体的择偶偏好分为水平偏好(horizontal preferences)和垂直偏好(vertical preferences)(Hitsch et al., 2010a)。水平偏好是指,人们在择偶时的偏好取决于配偶和本人特征间的比较,当水平偏好表现为更倾向与其自身条件相似的伴侣结婚时,将促成同型婚配决策。垂直偏好是指,人们在择偶时并不以本人特征为参照,而是普遍向上追求绝对特征具有优势的伴侣,如高收入或高教育伴侣,但在婚姻市场的双向筛选和匹配过程中并未被对方接受或并未收到对方的求偶,最终只能形成双方特征相匹配的同型婚配(Abramitzky et al., 2011)。当然,无论外部搜索摩擦还是内在择偶偏好,形成同型婚配的不同机制之间并不是互斥的,现实世界中观察到的同型婚配现象常常是两种机制共同塑造的结果。

本文聚焦于(无摩擦的)择偶偏好,基于匹配理论中的经典模型——Gale-Shapley 匹配模型(又称延迟接受匹配模型、延迟接受算法,简称GS模型或GS算法)(Gale and Shapley, 1962),模拟得到理论上的稳定婚姻匹配,并与现实匹配情况进行比较,探讨择偶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我国婚姻市场中的同型婚配。本研究的实现得益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中择偶偏好随机实验所收集的择偶偏好信息。该调查实验通过设计一个理想的、无外部搜索摩擦的场景,收集人们关于择偶和结婚的陈述性偏好。为系统性回答择偶偏好与同型婚配的关系,本文首先利用择偶偏好实验数据估计个体在不同维度上的择偶偏好,并区分出垂直偏好和水平偏好的边际效用;然后,借助GS算法,比较由无摩擦的择偶偏好所求解的稳定匹配与现实中存在搜索摩擦时形成的真实婚姻匹配之间的差异,以此探讨择偶偏好本身对婚姻市场中同型婚配的塑造作用;最后,考虑到水平偏好和垂直偏好在理论上均能达成同型婚配,本研究进一步实证分析两种偏好分别如何影响婚姻匹配。

本文有三个贡献。第一,本文基于全国代表性的择偶偏好实验数据,在技术层面上

实现了对年龄、教育和收入维度择偶偏好的无偏估计,并系统地区分了水平偏好与垂直偏好及其对婚姻匹配的影响。既有研究多使用在线约会网站或网络调查实验数据估计择偶偏好(Fisman et al., 2008; Hitsch et al., 2010a; Hitsch et al., 2010b; Ong, 2016),本文则基于概率抽样的随机实验设计,有效控制网络样本的选择偏误与特征相关性等内生性问题。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同型婚配主要源于人们的水平偏好而非垂直偏好,这一发现可与 Xie et al.(2015)对话,也呼应了美国与印度婚姻市场的相关实证结果(Hitsch et al., 2010a; Banerjee et al., 2013)。

第二,本文将个体择偶偏好与GS模型结合,丰富了国内关于婚姻匹配机制与市场结构稳定性的研究。一方面,当前我国婚姻经济学研究大多缺乏微观理论支撑,而主要诉诸社会学、人口学的解释。少数应用匹配理论的研究则聚焦于考察政策冲击对婚配模式的影响(Han et al., 2015; Chen and Choo, 2023; Huang et al., 2023),本文则结合择偶偏好和匹配模型来提供我国同型婚配模式在微观经济学层面的机制性解释。另一方面,本文进一步基于GS模型讨论了婚姻匹配不稳定性结构性来源,拓展了现有文献主要从微观家庭内部渠道(如婚后分工或生育)理解婚姻稳定性的研究路径(李兵等, 2024; 陈嫣然和秦雪征, 2019)。本文发现我国婚姻市场存在男性最优和女性最优的两种GS稳定匹配,且二者差异较大,这意味着性别间婚姻偏好与利益诉求的不一致,由此可能导致较高的婚姻不稳定性与离婚风险。

第三,本文提供了中国婚姻市场中使用无摩擦匹配模型的实证支持。匹配理论常假设婚姻市场中不存在搜索摩擦,但该假设在分析现实世界时的合理性需要讨论(Chiappori, 2020)。本文发现GS算法模拟无摩擦下的稳定匹配结果与现实婚配状况较为接近,表明当前中国的同型婚配主要由择偶偏好与市场机制共同塑造,而非由搜索摩擦驱动。这一发现为未来基于无摩擦匹配框架开展中国婚姻市场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

二、数据与变量

(一) 数据与实验设计

本文所用数据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实施的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CGSS 2021具有两项优势,可以满足本文的研究目标。第一,CGSS 2021搭载了择偶偏好随机实验,通过为受访者随机生成和分配虚拟配偶来构造无搜索摩擦的婚姻市场情景,直接测量人们在年龄、收入、家庭背景、房产、教育和外貌共六个维度上对理想结婚对象的择偶偏好数据,由此可得到不同维度的择偶偏好无偏估计;第二,CGSS 2021的调查对象为随机抽取住户中的某位家庭成员,对于当前有伴侣的受访者(包括当前有配偶或同居对象),CGSS 2021向其询问了伴侣的相关信息,因此,即便伴侣并未直接接受访问,仍可构建出受访者本人及其当前伴侣的配对样本信息,为比较由无摩擦的择偶偏好所模拟的稳定匹配和真实发生的婚姻匹配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可能性。遗憾的是,由受访者本人回答的伴侣信息并不包含择

偶偏好随机实验中的全部六项维度,只包括伴侣的年龄、教育、收入特征,因此,本研究仅能基于这三个维度的特征来作为个体综合考虑结婚决策的核心维度,比较这三个择偶维度上所预测的婚姻匹配与真实匹配之间的差异。实证样本限定在18岁及以上有伴侣的受访者群体。经过数据清理,最终样本量为6 007对配对样本,其中女性受访者及其伴侣(未受访男性)各为3 319人,男性受访者及其伴侣(未受访女性)各为2 688人。

具体介绍择偶偏好随机实验设计。该实验旨在考察个体内在择偶偏好,具体测量配偶年龄、收入、家庭背景、房产、教育和外貌共六维度特征对人们择偶偏好的边际效用(周扬等,2023)。实验分为两步:第一,针对每位受访者,实验过程中即时性生成三个前述六项维度特征上的随机组合,由此构成“虚拟配偶”甲、乙、丙三人在婚姻市场中的简历^①;第二,向每位受访者分别展示甲、乙、丙三位虚拟配偶的随机特征组合,请其评估各虚拟配偶作为自己理想结婚对象时的评分(1—7分)。由于受访者在调查实验中的择偶决策是针对随机生成的虚拟配偶进行的,放松了现实世界中人们择偶时的搜索摩擦约束,此时,受访者的择偶评分可以直接用于测量和估计无摩擦的择偶偏好。

(二) 变量

本研究的变量包括两部分。一是择偶偏好实验所涉及的虚拟配偶和受访者本人的各项维度特征(包括年龄、收入和教育),以及受访者对虚拟配偶的评分,用以估计各择偶维度上的垂直和水平偏好。二是由受访者提供的其真实伴侣(未受访者群体)年龄、收入和教育三个维度的特征,结合受访者本人特征,用以计算真实匹配中配偶双方在各维度上的特征相关性。通过模型估计获得的边际偏好及个体的各维度特征(包括受访者和未受访者),可以构建人们对样本中所有潜在择偶对象的偏好排序^②,进而借助GS算法模拟出稳定婚姻匹配,以此与真实婚姻匹配进行比较。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描述性统计

	全部受访者		全部受访者伴侣	
	女性	男性	未受访女性	未受访男性
	(1)	(2)	(3)	(4)
对虚拟配偶的评分	3.951	4.211	—	—
	(1.815)	(1.786)		

^① 其中,年龄维度是基于受访者性别而随机生成的相对数值,用于描述潜在择偶对象与受访者本人的年龄差。对于男性受访者来说,潜在择偶对象在年龄维度上的取值范围为 $[-15,5]$,例如“-15”表示虚拟生成的这位女性配偶比本人小15岁;对于女性受访者来说,择偶对象年龄维度的取值范围为 $[-5,15]$ 。收入维度的测量是一个相对度量值,是基于受访者本人年收入而生成的随机倍数,取值包括0.5、0.6、0.7、0.8、0.9、1、1.5、2、3,例如“0.5”表示虚拟配偶的收入是本人收入的50%。家庭背景维度是基于父母是否是城市户口的二分变量。房产维度是二分变量,标示虚拟配偶名下是否有房产。教育维度是分为高中、本科、研究生的三分类变量。外貌维度是分为“有点丑”“一般”“比较漂亮/帅”的三分类变量。

^② 在构建未受访者(受访者伴侣)对潜在配偶的偏好排序时,需假定男性和女性未受访者的择偶偏好与其同性别受访者的择偶偏好一致而进行外推。附录I中分性别展示了受访者群体与未受访者群体的年龄、收入和教育分布,两个群体在三个维度上的分布特征基本一致(附录I图I1),表明将受访者的择偶偏好参数外推应用于未受访者群体具有其合理性。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续表)

	全部受访者		全部受访者伴侣	
	女性 (1)	男性 (2)	未受访女性 (3)	未受访男性 (4)
年龄	51.998 (14.244)	55.939 (14.468)	53.847 (14.231)	53.599 (14.619)
收入	2.934 (5.296)	5.168 (7.069)	2.840 (5.508)	4.798 (6.893)
教育	8.398 (4.561)	9.629 (3.965)	7.890 (4.810)	9.305 (4.100)
N	3 319	2 688	2 688	3 319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收入的单位为万元。受访者伴侣群体中，未受访女(男)性为男(女)性受访者伴侣。

由于 CGSS 并未提供受访者伴侣的家庭背景、房产以及外貌维度信息，因此仅能基于年龄、收入和教育这三个具有完整配对信息的变量去探究择偶偏好和求取 GS 算法下的稳定匹配。考虑到实验中生成虚拟配偶各维度特征的过程随机，因此，与现实中的配偶情况不同，虚拟配偶所拥有的各维度特征间相互独立，即便只考虑实验中的单一或部分维度，也不会因遗漏变量而导致有偏的择偶偏好估计，第四部分第(一)节验证了此点。

三、实证方法

(一) 检验择偶偏好调查实验的随机性

为估计各维度择偶偏好的无偏边际效用，需要检验择偶偏好实验的随机性，即每位受访者所需评价的三位虚拟配偶各维度特征是否随机(周扬等，2023)。为此，首先需要检验每位虚拟配偶的生成是否随机。具体方法是根据受访者性别，分别检验虚拟配偶的相对年龄、相对收入和教育分布以及三个维度的组合分布是否均匀。其次需要检验每位受访者被分配的虚拟配偶是否随机。具体方法是依次将虚拟配偶的相对年龄、相对收入和教育作为因变量对受访者本人各项特征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受访者本人特征是否与分配的虚拟配偶无显著性关联。

(二) 估计择偶偏好

在通过择偶实验的随机性检验后，可以利用实验数据对择偶偏好进行估计，以获得个体在无搜索摩擦时的内在择偶偏好。遵循 Hitsch et al. (2010a) 的估计策略，个体通过择偶获得的效用取决于潜在配偶特征及可观测到的本人特征，此时，男性 m 评价虚拟女性配偶 w 作为理想结婚对象时评分可被公式(1)估计(女性 w 给虚拟男性配偶 m 评分同理，故省去)：

$$y_{mw} = x'_w \beta_M + (|x_w - x_m|'_+)^\alpha \gamma_M^+ + (|x_w - x_m|'_-)^\alpha \gamma_M^- + \delta_m + \epsilon_{mw}, \quad (1)$$

其中, y_{mw} 是男性 m 给虚拟女性配偶 w 的评分, 反映虚拟女性配偶 w 给男性 m 带来的择偶效用。等式右边第一项 $x'_w \beta_M$ 是潜在女性配偶自身的各项维度特征对男性择偶时带来的效用(垂直偏好), x 包括虚拟配偶的年龄、收入和教育三个变量。第二项和第三项则是将男性对虚拟女性配偶的择偶偏好与男性自身特征相关联, 表示男性本人和潜在女性配偶之间在同一特征上的差异为其带来的择偶效用(水平偏好)。若女性和男性之间某一特征的差异为正, 则用 $|x_w - x_m|_+$ 表示; 若差异为负, 则取差异的绝对值并用 $|x_w - x_m|_-$ 表示。^① 两个差异项均取幂 α 以防止完全共线性。^② 以年龄差为例, 当考察男性 m 的择偶偏好是否受本人与女方 w 间的年龄差所影响时, 若模型中估计出正向年龄差和负向年龄差两部分所对应的系数 γ_M^+ 和 γ_M^- 均显著为负, 则表明男性更偏好于年龄相仿的女性伴侣, 选择比自己年龄大或小的配偶均会给自己带来负效用。第四项 δ_m 为个人固定效应。加入个人固定效应的原因有二: 一是考虑到个体在择偶时可能存在不随潜在配偶变化而变化的独有的偏好理念, 可以用个人固定效应进行捕捉; 二是无偏的择偶偏好应借助个体内差异进行估计, 这是由于一方面, 个体间的主观评分标准可能存在差异, 即每个个体衡量潜在配偶的标尺不同, 另一方面, 虽然实验设计中虚拟配偶在年龄、收入两项择偶维度上的取值是随机分配的, 但均是基于受访者本人的年龄和收入而设计的相对测量指标, 衡量的分别是“与本人的年龄差几岁”和“是本人收入的几倍”, 因此需要加入个人固定效应以基于个体内部差异来确保估计出无偏的择偶偏好效用。最后一项 ϵ_{mw} 为误差项。

(三) 基于 GS 算法模拟稳定婚姻匹配

在获得无摩擦的择偶偏好参数后, 可以利用 GS 算法进行模拟, 从而获得纯粹基于偏好形成的稳定婚姻匹配, 将其作为择偶偏好所预测的婚姻匹配的效率基准, 用以比较真实的婚姻匹配。GS 模型是婚姻模型中针对双向选择情境如何形成稳定匹配的经典模型, 从理论层面捕捉了婚姻市场中双边“一对一”选择结婚对象的动态过程中, 参与者通过重复轮次的表白(求婚)和相应的接受或拒绝来最终实现稳定性匹配。具体方法是, 根据个体本人特征、潜在配偶特征和估计出的择偶偏好参数, 构建出每个个体对于实证样本中所有潜在择偶对象的偏好排序, 进而根据每位男性和女性所各自构建的偏好顺序, 利用 GS 算法求解出稳定的配对。在稳定的配对中会显示每位男性最终娶了哪位女性(或每位女性嫁给了哪位男性), 而不存在一对男女彼此均更偏好于对方但却互相不是自己当前配偶的情况。GS 算法可以提供两种稳定匹配解, 分别是“男性最优”(men-optimal)

① 具体的计算公式是, $|a - b|_+ = \max(a - b, 0)$, $|a - b|_- = \max(b - a, 0)$ 。

② 由于线性形式($\alpha=1$)的公式(1)中将同时包含 x_w , $x_w - x_m$ 和 x_m (x_m 包含在 δ_m 个人固定效应中), 三者的完全共线性导致公式(1)无法识别。为此, 遵循 Hitsch et al. (2010b)提供的做法, 将公式(1)中的水平偏好项取二次型($\alpha=2$), 从而解决完全共线性问题以实现模型的识别。

和“女性最优”(women-optimal)稳定匹配(Gale and Shapley, 1962)。① 男性最优稳定匹配是男性向女性提出求婚,由女性接受或拒绝这些求婚;女性最优匹配则相反。根据稳定匹配的数学性质,可证出对于最终达成的男性(女性)最优稳定匹配,每个女性(男性)都会得到她(他)最不满意的可能的配偶,也即男性(女性)最优匹配的同时也是女性(男性)最差的稳定匹配(Iwama and Miyazaki, 2008)。

GS算法在本研究中具有理论基础、技术优势和现实可操作性三方面适用性。第一,GS模型作为无摩擦匹配理论框架下的经典模型,在理论层面捕捉了双边“一对一”婚姻市场中个体决策的动态过程和实现市场稳定性匹配的理念(Gale and Shapley, 1962),为现实世界中复杂且具体的婚姻匹配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可供检验的市场均衡模型的理论抽象(Hitsch et al., 2010a)。第二,GS算法在技术层面具有良好的数学性质,在婚姻市场所可能形成的众多匹配解中提供一个效率上的基准,其所求取出的稳定匹配是所有稳定匹配集合中的(单边)帕累托最优匹配(Roth and Sotomayor, 1990),也即男(女)性之间不可能通过重新匹配实现帕累托改进而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通过将某一特定婚姻市场中的现实匹配结果与GS匹配结果进行比较,可以搭建起理论模型上的效率基准与经验现实中的匹配结果之间的关联。第三,GS算法作为无摩擦匹配理论模型,在实证操作层面适配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实验数据,择偶偏好随机实验设计得到的正是人们在无搜索摩擦环境下的陈述性择偶偏好。

遵循 Hitsch et al. (2010a)提供的实证策略,利用GS算法模拟稳定婚姻匹配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从择偶偏好无偏估计的渐近联合分布中为每一位个体(包括受访者本人及其当前伴侣)按性别随机抽取公式(1)中各项的偏好参数②。

第二步,基于公式(1),为每一对潜在配偶抽取随机效用项 ϵ_{mw} ③。结合第一步所抽取到的偏好参数和每一位潜在配偶真实的年龄、收入和教育特征,可以得到每一位男性和女性对于所有潜在配偶的效用估计值,从而获得所有人的最终偏好排序。

① GS算法通过以下步骤达到男性最优的稳定匹配解:男性向女性提出求婚,女性接受或拒绝这些提议。该算法分几轮进行。在第一轮中,每位男性向他最偏好的女性求婚。然后,女性收集来自男性们的求婚,对所有向她们求婚的男性进行排序,保留排名最高的男性,拒绝掉其他男性的求婚。在第二轮中,那些目前没有匹配的男性向他们偏好排序名单上的下一位女性求婚。同样,女性考虑所有在这一轮中向她们求婚的男性,包括第一轮中已经匹配的男性,并保留其中排名最高的男性。在随后的每一轮中,那些目前没有匹配的男性向他们之前没有求婚过的最高排名的女性求婚,而女性则选择目前所有可行伴侣中排名最高的男性。算法在有限轮数后结束,此时,男性和女性要么有了伴侣,要么保持单身。女性最优匹配采用相同算法求解,区别在于由女性提出求婚,男性接受或拒绝这些提议。

② 简要说明如下:第一,这里涉及将估计出的偏好参数外推应用于样本外(配对样本中作为受访者伴侣出现的未受访者样本),附录I的稳健性检验中详细讨论了该点。第二,虽然由公式(1)估计出的个人固定效应也有其分布,但这里假定个人固定效应不变。第三,关于受访者伴侣的个人固定效应,考虑到个人固定效应背后的意义是个体对于择偶的固有偏好态度,由该个体自身的年龄(生命历程)、教育以及收入(经济状况)所影响,且由于目前配对样本双方均有的特征仅包含年龄、收入和教育三个变量,因此,我们利用OLS分性别估计受访者的个人固定效应对这三个变量的回归结果,继而应用于未受访者以得到其个人固定效应。OLS回归结果展示出非常强的解释力,男性和女性受访者个人固定效应的回归模型拟合优度 R^2 分别为0.870和0.749。因此,我们认为使用年龄、收入和教育三个变量进行线性外推并不会带来严重的外推错误问题。

③ 假定 ϵ_{mw} 服从正态分布。当计算男性为所有潜在女性配偶进行偏好效用排序时,我们基于从男性视角的 ϵ_{mw} 的分布中为每一对潜在配偶进行随机效用抽取,而当计算女性为所有男性潜在配偶进行排序时,我们基于从女性视角的 ϵ_{wm} 的分布中抽取。

第三步,利用 GS 算法进行模拟,分别计算出男性最优和女性最优稳定匹配结果,并计算稳定匹配中的配对双方年龄、收入和教育三个维度上的特征相关性。采用 Bootstrap 方法将上述过程重复 100 次,以获得相关系数的均值和标准差,将其与样本中真实匹配的受访者及其伴侣的特征相关性进行比较,从而考察择偶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现实世界中婚姻匹配的形成。

(四) 分析垂直偏好与水平偏好对婚姻匹配的差异化影响

进一步分析垂直偏好和水平偏好分别如何影响 GS 算法所获得的稳定匹配。我们分别将公式(1)中的 β 和 γ 系数设置为零,构造出无垂直偏好和无水平偏好这两种反事实场景,进而分别在这两种反事实的偏好规范下模拟出新的稳定匹配。例如,当将衡量水平偏好效用的 γ 系数设置为零时,是假定人们对水平偏好并不敏感,也即假定人们在择偶时并不看重配偶特征与本人特征的差异。通过比较在无水平偏好的反事实场景下新的 GS 稳定匹配与既有 GS 匹配结果,来讨论水平偏好在形成婚姻匹配中发挥的作用。此外,通过分性别对无垂直偏好和无水平偏好这两种反事实场景分别进行设定,可以进一步检验两种偏好在影响婚姻匹配时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

四、数据结果

(一) 择偶偏好的估计结果

我们首先检验了择偶偏好实验的随机性(附录 II),进而估计无偏的择偶偏好参数。表 2 展示了男女两性在年龄、收入和教育上的择偶偏好边际效用估计。为检验模型稳健性,第(2)列和第(4)列分别在第(1)列和第(3)列基础上控制了虚拟配偶的家庭背景、房产和外貌特征,年龄、收入和教育维度的回归系数几无变化,这表明仅使用择偶偏好实验中的年龄、收入和教育三个维度进行回归并不影响对该三个维度的效用估计。

比较表 2 第(1)列和第(3)列结果可知,男女两性在年龄维度均偏好与自身年龄相仿的伴侣,年龄差(无论正向或负向)显著降低择偶效用,显示出年龄同型婚配倾向。男女两性在收入维度均展示出显著的损失厌恶偏好。女性比男性更垂直偏好于高收入配偶,此外,女性水平偏好于比自己收入高的男性,同时显著地排斥低于自身收入的男性;而男性并不偏好于高于自身收入的配偶,但也会显著排斥低于自身收入的女性。这一发现与程时雄(2022)的发现一致,即男性虽然越来越看重配偶收入,但主要表现在对低于自身收入女性的排斥,而对高于自身收入女性配偶仍有所顾虑。男女两性在教育维度均垂直偏好于高教育配偶。但女性未水平偏好于教育远高于自己的男性,而男性则会显著排斥低于自身教育的女性。对高学历配偶的垂直偏好也被 Banerjee et al. (2013)在印度婚姻市场中证实,而 Hitsch et al. (2010a)则发现美国仅女性对配偶教育存在垂直偏好。Ong (2016)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女性偏好于高教育配偶或源于教育是收入潜力的信号。

表 2 分性别的择偶偏好的边际效用

	女性受访者		男性受访者	
	(1)	(2)	(3)	(4)
虚拟配偶年龄	0.004 (0.012)	0.005 (0.011)	-0.005 (0.012)	-0.003 (0.012)
正向年龄差异的平方	-0.005*** (0.001)	-0.005*** (0.001)	-0.021*** (0.005)	-0.021*** (0.005)
负向年龄差异的平方	-0.016*** (0.005)	-0.015*** (0.005)	-0.004*** (0.001)	-0.004*** (0.001)
虚拟配偶收入	0.008+ (0.005)	0.008+ (0.004)	0.001 (0.003)	0.003 (0.003)
正向收入差异的平方	0.101*** (0.016)	0.103*** (0.016)	0.015 (0.018)	0.013 (0.017)
负向收入差异的平方	-2.442*** (0.223)	-2.528*** (0.215)	-1.061*** (0.234)	-1.126*** (0.229)
虚拟配偶教育	0.098*** (0.014)	0.096*** (0.013)	0.032* (0.015)	0.032* (0.014)
正向教育差异的平方	-0.002** (0.001)	-0.002** (0.001)	-0.0002 (0.001)	-0.0001 (0.001)
负向教育差异的平方	-0.004 (0.007)	-0.003 (0.007)	-0.016* (0.007)	-0.017* (0.007)
虚拟配偶家庭背景		已控制		已控制
虚拟配偶房产		已控制		已控制
虚拟配偶外貌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945	0.948	0.955	0.957
N	9 957	9 957	8 064	8 06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估计时将本人与虚拟配偶的差异项取平方以防止完全共线性。虚拟配偶年龄是由受访者本人年龄和实验中随机分配的与受访者的年龄差相结合转换而成的绝对年龄；虚拟配偶收入是由受访者本人收入和实验中随机分配的随机倍数相结合转换而成的绝对收入，单位为万元；年龄和收入均作为连续变量使用。基于实验设计，虚拟配偶收入是受访者收入的随机倍数，因此，收入差异项采用(收入倍数-1)来衡量，分别用正向收入差异和负向收入差异两个变量表示。虚拟配偶教育由分类变量转换为受教育年限的连续变量，高中、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分别为12、16、19年。正向教育差异和负向教育差异两个变量衡量虚拟配偶与本人受教育年限之差。

(二) 比较 GS 算法模拟的稳定匹配与真实匹配

首先关注配偶双方的真实婚姻匹配情况。配偶双方的特征相似性在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得到广泛研究。本研究同样发现，真实婚姻匹配中年龄、收入和教育维度均呈现同型婚配模式(表 3 Panel A 第(1)列)。其中，年龄在真实配偶间呈现强相关，而

收入和教育相关性也均中等相关。进一步看特征差异(表3 Panel B中第(1)—(2)列), 男性平均比女性年长1.867岁, 年收入多1.964万, 教育多1.274年, 特征差异的分布较为离散。

表3 基于择偶偏好和GS算法模拟的婚姻匹配与真实匹配

Panel A: 配偶双方各维度的相关性						
	真实匹配		GS 模拟匹配			
			男性最优		女性最优	
	(1)		(2)		(3)	
年龄	0.964		0.922		0.984	
			(0.006)		(0.001)	
收入	0.464		0.406		0.841	
			(0.030)		(0.016)	
教育	0.657		0.404		0.641	
			(0.026)		(0.025)	

Panel B: 配偶双方各维度的差异						
	真实匹配		GS 模拟匹配			
			男性最优		女性最优	
	差异均值	差异标准差	差异均值	差异标准差	差异均值	差异标准差
	(1)	(2)	(3)	(4)	(5)	(6)
年龄	1.867	3.901	1.709	5.554	1.361	2.556
收入	1.964	6.496	1.806	5.113	2.511	3.641
教育	1.274	3.659	0.673	4.543	1.377	3.486

注: Panel A 的第(1)—(3)列汇报了 Pearson 相关系数, 其中第(1)列为真实匹配情况, 第(2)—(3)列为由 GS 算法预测稳定匹配双方各维度特征的相关系数, 该相关系数为 100 次模拟匹配后求取的均值, 括号内则为 100 次模拟匹配后获得的相关系数的标准差。Panel B 中第(1)—(2)列汇报的是真实匹配双方各维度特征上的差异(男性特征—女性特征), 第(3)—(6)列分别为由 GS 算法预测的男性最优和女性最优匹配中配偶双方各维度的特征差异值, 该差异值为 100 次模拟匹配后求取的差异值的均值, 差异值的标准差为 100 次模拟匹配后差异标准差的均值。

进而关注理论层面纯粹由择偶偏好所达成的 GS 稳定匹配结果。表 3 Panel A 第(2)—(3)列和 Panel B 第(3)—(6)列分别展示了男性最优和女性最优稳定匹配中配偶双方特征相关性和差异分布。总的来说, 男性和女性最优匹配的差异较大。男性最优匹配中配偶双方的理想收入相关性为 0.406, 收入差为 1.8 万; 而女性最优匹配中收入相关性高达 0.841, 收入差为 2.5 万, 且差异分布更集中。同样的, 男性最优匹配的教育相关性为 0.404, 教育差约为 0.7 年; 而女性最优匹配的教育相关性为 0.641, 教育差约为 1.4 年。男性最优和女性最优稳定匹配间呈现的差距, 表明当前婚姻市场存在不唯一的稳定匹配解, 意味着在我国这一特定的婚姻市场结构中, 男女双方对婚姻匹配的偏好和利益诉求并不一致, 由此使男女双方均同时满意的婚姻匹配可能较难达成。这一实证发现有助于从宏观市场均衡层面来理解婚姻稳定性问题, 揭示了我国婚姻市场匹配过程中的结构性

问题和婚姻匹配不稳定的深层根源。

最后结合真实匹配中配偶特征相关性与GS稳定匹配结果进行比较。第一,男性最优和女性最优稳定匹配中年龄维度相关性均与真实年龄匹配情况基本一致,均呈现出高度相关。且从配偶双方年龄差异来看,GS匹配与真实匹配中均呈现出男方比女方年长不足两岁,其中女性最优匹配中夫妻年龄差相对更小。

第二,收入维度上,男性最优匹配与真实匹配更为相近(相关系数分别为0.406和0.464),均明显低于女性最优匹配中的收入相关性。从匹配双方收入差异的分布情况来看,仍然是男性最优匹配与真实匹配更为接近。而女性最优稳定匹配中,男女双方平均收入差则更大,且离散程度更低,反映了女性群体内部对配偶收入的偏好较为一致。

女性最优匹配之所以在收入维度呈现出高相关性、高夫妻收入差和低离散性,可能源于女性对配偶收入的强烈偏好(见表2)。当女性作为主动求婚者,也即优先满足女性择偶偏好进行GS匹配时,偏好排序中靠前的潜在配偶是那些在收入维度占据优势的男性,最终形成女性最优匹配。而女性最优收入匹配与真实匹配间的巨大差异也表明现实婚姻中女性对于配偶的收入偏好并没有完全满足,由此可以侧面解释为什么无论丈夫的家务贡献如何,妻子对丈夫的经济贡献都不太满意(Chen and Hu, 2021)。因为相对而言,现实世界所达成的收入匹配,无论从相关性还是收入差异的分布来看,显然更接近于男性最优匹配结果。

第三,教育维度上,则是女性最优匹配与真实匹配更为一致(相关系数分别为0.641和0.657),明显高于男性最优教育匹配结果。而从配偶双方教育差异的分布看,男性最优匹配中配偶教育差异的分布过于离散。一方面,真实匹配中配偶教育相关性远高于男性最优匹配结果,与既有研究发现一致(Hitsch et al., 2010a; Lee, 2009),其原因可能在于,现实婚姻市场中教育维度的搜索摩擦较大。学校作为重要的局部婚姻市场,塑造了相对隔离的群体边界,相似教育者有更高的概率相遇和相处(Lee, 2009)。与之相呼应的,Hitsch et al. (2010a)发现在线约会平台减少了线下婚姻市场中的搜索摩擦,教育同型匹配则相应减少。另一方面,真实匹配中配偶教育相关性与女性最优匹配结果基本达成一致,其原因可能在于,相对于男性,女性在收入和教育两个维度上均存在较强的择偶偏好,但现实择偶时可能因难以兼得而需要取舍。相对于收入,教育是易观察特征而易被优先满足,因此,对于现实匹配中的女性来说,较高程度的教育匹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其配偶的收入偏好,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现实收入匹配与女性最优收入匹配差距较大。

综上,基于择偶偏好所形成的男性最优和女性最优稳定匹配在特定择偶维度上与真实婚姻匹配均较为一致,这表明相对于搜索摩擦,择偶偏好和婚姻市场机制是塑造当前我国同型婚配模式的主导因素。这一发现与Hitsch et al. (2010a)形成对话,其试图考察在线约会网站这一近似无搜索摩擦的婚姻市场设计能否形成稳定且效率的婚姻匹配模式,他们发现基于在线约会时的择偶偏好所得到的GS匹配与真实婚姻匹配存在较大差距,这可能是由于人们在约会时的择偶偏好和选择理想结婚对象的偏好并不一致。此外,匹配理论强调的无摩擦假设能否用于分析某一特定婚姻市场因情况而异(Chiappori,

2020), 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后续研究我国婚姻经济学现象时应用无摩擦匹配理论框架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

(三) 垂直偏好与水平偏好对稳定匹配的影响

本节通过构建两种反事实情景——无水平偏好与无垂直偏好, 进一步探讨垂直偏好和水平偏好分别如何影响形成稳定匹配。每种情景下依次假定: 男女均无水平(垂直)偏好、仅女性无水平(垂直)偏好、仅男性无水平(垂直)偏好, 模拟出新的 GS 稳定匹配。当假定男女均无水平偏好时(表 4 第(2)列), 男性最优和女性最优匹配中配偶双方各维度特征(尤其是年龄)相关性均较无假定时发生较大变化; 而无垂直偏好情景下(表 4 第(5)列)的稳定匹配则变化不大。这表明相较于垂直偏好, 水平偏好在塑造婚姻匹配模式时的作用更为关键, 即同型婚配主要源于人们对于配偶与自身特征差异的偏好而非对配偶绝对特征的偏好。进一步分性别考察两种偏好的作用, 设定男性无水平偏好(表 4 第(4)列)时对匹配结果的影响更大, 表明男性的水平偏好在塑造婚姻匹配时的作用更大; 而在垂直偏好方面, 无论设定男性或女性无垂直偏好时的 GS 匹配结果均变化不大, 表明男女两性在垂直偏好上均较不敏感。

表 4 无水平偏好与无垂直偏好时 GS 稳定匹配中配偶双方特征的相关性

配偶双方各维度的相关性	无假定	假定水平偏好项的系数为 0			假定垂直偏好项的系数为 0		
		全部	女性	男性	全部	女性	男性
	(1)	(2)	(3)	(4)	(5)	(6)	(7)
年龄	0.922	0.096	0.637	0.426	0.923	0.921	0.922
	(0.006)	(0.047)	(0.028)	(0.034)	(0.004)	(0.005)	(0.005)
男性最优匹配	收入	0.406	0.212	0.330	0.233	0.363	0.362
		(0.030)	(0.049)	(0.051)	(0.056)	(0.040)	(0.046)
	教育	0.404	0.278	0.367	0.275	0.377	0.348
		(0.026)	(0.038)	(0.033)	(0.036)	(0.034)	(0.032)
年龄	0.984	0.083	0.675	0.410	0.982	0.982	0.984
	(0.001)	(0.047)	(0.029)	(0.036)	(0.002)	(0.002)	(0.002)
女性最优匹配	收入	0.841	0.353	0.557	0.395	0.881	0.859
		(0.016)	(0.081)	(0.044)	(0.076)	(0.030)	(0.032)
	教育	0.641	0.736	0.746	0.498	0.663	0.604
		(0.025)	(0.019)	(0.018)	(0.031)	(0.029)	(0.026)
							(0.022)

注: 相关性汇报的是 100 次 GS 模拟匹配后求取的 Pearson 相关系数的均值, 括号内是对应的标准差。水平偏好项包括正、负向年龄差异, 正、负向收入差异, 正、负向教育差异六个变量。垂直偏好项包括配偶年龄、收入、教育三个变量。分三种情形假定水平偏好项的系数为 0, 包括男女两性均无水平偏好、仅女性无水平偏好、仅男性无水平偏好; 垂直偏好的假定同理。

既有研究通过模拟方法证实仅存在垂直偏好时就能形成同型婚配(Xie et al., 2015), 而本小节则通过设置不同反事实情景来系统比较水平偏好和垂直偏好对稳定匹配的塑造, 以证实主要是水平偏好下的市场均衡驱动了同型婚配, 且从性别差异来看, 男

性的水平偏好在塑造婚姻匹配时的作用更大。这一发现与 Hitsch et al. (2010a)和 Banerjee et al.(2013)对美国和印度婚姻市场的发现一致,同样是水平偏好影响稳定婚姻匹配的作用更大。

(四) 其他稳健性检验

首先,考虑到样本中存在相当比例的零收入者(附录 I 图 I 1),我们限制样本为双收入家庭样本,用以比较双收入配偶的真实匹配与 GS 模拟匹配中的特征相关性;其次,我们对择偶效用函数中的随机误差项进行了稳健性分析,用以纠正择偶实验评分时可能出现的随机性错误。结果见附录 III。

五、未来拓展和政策含义

本文有几点说明和未来拓展方向。第一,截面调查 CGSS 2021 中已婚样本是婚后参与的调查实验,其择偶偏好存在被现实配偶和婚姻生活所改变的可能性,由此得到 GS 稳定匹配与现实匹配较为一致的结果。为此,通过检验择偶偏好的婚龄异质性发现,新婚群体和久婚群体的择偶偏好并无显著差异,在平均意义上排除了长期的婚姻生活对择偶偏好的重塑。此外,考虑到已婚样本的平均年龄偏大,我们检验了择偶偏好的年龄异质性未发现显著差异。具体结果见附录 IV。第二,现实世界婚姻匹配过程由每个个体复杂且具体的实际婚姻行为决策汇总而成,并不能完全由 GS 匹配理论描述(Hitsch et al., 2010a),GS 算法提供的是无摩擦假设下分析婚姻匹配和市场均衡时的理论抽象和数学简化,而非旨在刻画真实世界中微观个体择偶和结婚发生时的实际行为和具体过程。第三,GS 模型描述的是不可转移效用框架(non-transferable utility),也即个体间效用独立,不能通过交换或转让来影响配偶的效用(Chiappori, 2020),如个体的年龄、教育等通常被视为婚姻关系中的不可转让特征。但婚姻中也可能发生一方的资源通过协商、交换或合作而影响另一方效用,如收入、财产等特征可通过共享或转让而使配偶效用变化,那么收入维度的真实匹配就有可能是婚后配偶双方家庭分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体现。受限于择偶实验数据特点,本文目前仅能支持不可转移效用框架下的分析,未来研究可以基于可转移效用框架丰富择偶偏好与同型婚配关系的讨论。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本研究发现当前的同型婚配现象主要是由个体的内在择偶偏好所驱动和塑造的,这在实证层面揭示了我国婚姻市场的运作和匹配机制,也意味着政策层面引导民众择偶观具有实践意义。第二,本研究发现当前婚姻市场在实现理论层面的稳定匹配时存在不唯一结果,这表明男女两性对婚姻匹配的偏好诉求和利益分配存在结构层面的不一致,也意味着当前的婚配现状可能蕴含着不稳定性或结构性失衡,由此既衍生出婚姻满意度和婚姻质量下降、不婚率和离婚风险上升、生育率下降等问题,也将影响未来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为此,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优化婚姻市场的匹配机制,将有助于提高婚姻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婚姻收益,并将在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层面带来积极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Abramitzky, R., A. Delavande, and L. Vasconcelos, "Marrying Up: The Role of Sex Ratio in Assortative Matching",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1, 3(3), 124-157.
- [2] Banerjee, A., E. Duflo, M. Ghatak, and J. LaFortune, "Marry for What? Caste and Mate Selection in Modern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2013, 5(2), 33-72.
- [3] Bratsberg, B., S. Markussen, O. Raaum, K. Roed, and O. Rogeberg, "Trends in Assortative Mating and Offspring Outcomes", *Economic Journal*, 2023, 133(651), 928-950.
- [4] Chen, L., and E. Choo, "Identification and 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Empirical Dynamic Marriage Matching Models", *Economic Journal*, 2023, 133(651), 1005-1035.
- [5] 陈嫣然、秦雪征, "配偶年龄差距对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基于 CHARLS 2013 年全国数据", 《劳动经济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第 53—79 页。
- [6] Chen, Y., and D. Hu, "Gender Norms and Marriage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1, 68, 101627.
- [7] 程时雄, "婚姻匹配理论及其实证应用新进展", 《人口学刊》, 2022 年第 6 期, 第 15—32 页。
- [8] Chiappori, P. A., "The Theory and Empirics of the Marriage Market",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20, 12, 547-578.
- [9] Chiappori, P. A., B. Salanié, and Y. Weiss, "Partner Choice, Investment in Children, and the Marital College Premi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8), 2109-2167.
- [10] Choo, E., "Dynamic Marriage Matching: An Empirical Framework", *Econometrica*, 2015, 83(4), 1373-1423.
- [11] Choo, E., and A. Siow, "Who Marries Whom and W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6, 114(1), 175-202.
- [12] Fisman, R., S. S. Iyengar, E. Kamenica, and I. Simonson, "Racial Preferences in Dating",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 75(1), 117-132.
- [13] Gale, D., and L. Shapley, "College Admiss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1962, 69(1), 9-15.
- [14] Garcia-Hombrados, J., and B. Özcan, "Age at Marriage and Marital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24, 22(1), 297-328.
- [15] Greenwood, J., N. Guner, G. Kocharkov, and C. Santos, "Marry Your Like: Assortative Mat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5), 348-353.
- [16] Han, L., T. Li, and Y. Zhao, "How Status Inheritance Rules Affect Marital Sorting: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5, 125(589), 1850-1887.
- [17] Hitsch, G. J., A. Hortacsu, and D. Ariely, "Matching and Sorting in Online Dat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a, 100(1), 130-163.
- [18] Hitsch, G. J., A. Hortacsu, and D. Ariely, "What Makes You Click? Mate Preferences in Online Dating", *Quantitative Marketing and Economics*, 2010b, 8(4), 393-427.
- [19] Huang, W., Y. Pan, and Y. Zhou, "One-Child Policy, Marriage Distortion, and Welfare Los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3, 1-47.
- [20] Iwama, K., and S. Miyazaki, "A Survey of the Stable Marriage Problem and Its Variants", *Proceedings-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c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Knowledge-Circulating Society*, 2008, 131-136.
- [21] Lee, S., "Preferences and Choice Constraints in Marital Sorting: Evidence from Korea", *Mimeo*, 2009. <https://citeseerx.ist.psu.edu/document?repid=rep1&type=pdf&doi=8cb6177d3de1370fe7bdcf422393edc3857882eb>.
- [22] 李兵、赵沛炫、郭冬梅, "教育水平‘般配’就能幸福终老吗? ——正向教育选型婚配倾向与离婚率", 《经济科学》,

2024 年第 3 期, 第 199—219 页。

- [23] 刘怡、李智慧、耿志祥, “婚姻匹配、代际流动与家庭模式的个税改革”, 《管理世界》, 2017 年第 9 期, 第 60—72 页。
- [24] 马磊, “偏好与结构——同型婚配的形成机制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8 期, 第 76—85 页。
- [25] Ong, D. “Education and Income Attraction: An Online Dating Field Experiment”, *Applied Economics*, 2016, 48(19), 1816-1830.
- [26] Roth, A. E., and M. A. O. Sotomayor, *Two-Sided Matching: A Study in Game-Theoretic Modeling and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7] Xie, Y., S. Cheng, and X. Zhou, “Assortative Mating Without Assortative Pre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5, 112(19), 5974-5978.
- [28] 周扬、於嘉、谢宇, “择偶偏好中的性别差异和社会阶层异质性——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探索”, 《社会学研究》, 2023 年第 38 期, 第 107—130 页。

Mate Preferences and Assortative Mating: Evidence from the Mate Preference Survey Experiment

SHI Zehu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OU Ya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mate preference survey experiment and the deferred acceptance algorithm to simulate frictionless stable matches and compare them with real marriages and explore how mate preferences shape homogamy in marriage market. Key findings reveal that both genders prioritize age/educational homogamy, but women strongly prefer higher-income partners, and both genders avoid lower-income ones; simulated frictionless stable matches closely align with actual marriages, indicating mate preferences primarily drive assortative mating; moreover, horizontal preferences outweigh in driving assortative mating.

Keywords: mate preferences; assortative mating; deferred acceptance algorithm

JEL Classification: J12, J16, C78

* Corresponding Author: ZHOU Ya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he University Park, Changping District, Beijing 102206, China; Tel: 86-18401643200; E-mail: zhouyang831@cufe.edu.cn.